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322–335.**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30andmj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论 20 世纪初日本“海国”美学叙事与畸变
——以高桥铁太郎的《海洋审美论》为中心

商 倩（Shang Qian） 巩雪松（Gong Xuesong）

摘要：高桥铁太郎所著《海洋审美论》可谓近代日本以“海国美学”为名的叙事滥觞，他将科学话语、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进行工具化整合，通过对海洋审美符号的塑造与操控，将“海洋学”视为海上扩张的地图指南，将海洋文学、海洋文化塑造为海权逻辑的线性叙事，将倭寇诡辩为“雄飞海外”的英雄，将“东洋的英国”转译为日本的镜像想象，使国族的海洋审美想象最终畸变为帝国扩张与争夺海权的政治诉求。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宣扬的海洋审美畸变符号不仅在战前、战时得到强化，甚至在战后乃至当代犹暗流涌动。其后继者们几乎无需创新，只不断重复既有话语符号并赋予新的政治意象，就能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叙事重新推入公共议论场域，从而了无痕迹地在“海国日本”与“新海洋立国”之间完成暧昧不清的转换，深刻影响了日本“海国”叙事的延续与重构。

关键词：高桥铁太郎；《海洋审美论》；海国日本；殖民扩张

作者简介：商倩（通讯作者），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海洋文学与文化。电子邮箱：shangqian.1987@163.com。**巩雪松**，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g15854351002@163.com。

Title:On the Aesthetic Narrative and Distortion of Maritime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Centering on Tetsutaro Takahashi’s *Theory of Marine Aesthetics*

Abstract: Tetsutaro Takahashi’s *Theory of Marine Aesthetic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the narrative under the name of Maritime Nation Aesthetics in modern Japan. Takahashi

Received: 01 Sep 2026 / Revised: 15 Sep 2026 / Accepted: 23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instrumentally integrates scientific discourse, literary writing, and historical memory, treating oceanography as a navigational guide for maritime expansion, molding marine literature and marine culture into a linear narrative of maritime power logic, sophistically portraying Japanese pirates as heroes venturing overseas, and translating the "Britain of the East into Japan's mirror image. This ultimately distorts the national aesthetic imagination of the ocean into a political demand for imperial expansion and the pursuit of maritime power. More notably, the distorted symbols of marine aesthetics he promoted were not only reinforced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but have continued to surge as an undercurrent even in the post-war period and up to the present day. His successors have had little need for innovation; by merely repeating existing discursive symbols and imbuing them with new political imagery, they have effortlessly reintroduced these narratives into the public discourse. This has seamlessly facilitated an ambiguous transition between Maritime Japan and the New Maritime Nation,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continu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 narrative.

Keywords: Tetsutaro Takahashi; *Theory of Marine Aesthetics*; Maritime Japan; Colonial Expansion

Author Biographies:Shang Qia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shangqian.1987@163.com.**Gong Xuesong**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mail: g15854351002@163.com.

引言

日本自 2007 年通过《海洋基本法》以来，一直标榜所谓“新海洋立国”，寻求海洋思想的转型，相继出台 4 期《海洋基本计划》，提出“海洋的和平与安全”、从“被海洋守护之国”到“守护海洋之国”等目标，并持续将“增进国民对海洋的理解”列为核心目标之一，试图构建全民参与的海洋发展路径。①然而，另一方面，日本频繁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在南海地区制造事端、更罔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强行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做出一系列影响亚洲海域和平稳定以及实质性伤害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暴露出一种矛盾的、割裂的海洋认知。日本这种政策上推动国民形成新的海洋认识但实际行动上背道而驰的做法，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海洋想象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内在畸变形成了惊人的历史呼应，其中的关联亟待深入探究。

管见所及，高桥铁太郎所著《海洋审美论》（1903）系日本近代首次提出“海洋审美”概念的著作，该著试图通过审美批评构建一种权威化的海洋认识解释，可谓文化主体主动对接国家意志来塑造大众审美经验的典型尝试。本论拟以《海洋审美论》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明治时期被塑造的海洋审美符号及其融入日本海洋想象的过程，以期从源头上厘清日本海洋认识割裂性的历史成因，为进一步理解日本当代海洋政策与行为提供必要的历史维度解释与文化层面的批评视角。

一、海洋审美装置的重塑与颠倒：“诱国民向海之趣”

《海洋审美论》的扉页是一幅题为“海洋”的黑白插图，构图神似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却又与之不同：插图的前方是汹涌翻滚着的滔天巨浪，远处则是一条木船在大海中倾斜欲覆、岌岌可危。这幅危机构图与高桥铁太郎的“亡国论”互相呼应：“当下若我大日本帝国不在此（即海洋）倾注全力，则国运必日趋衰微，终将重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覆辙”（261）。对于这种危机渲染，既有研究已敏锐地指出其扩张本质。如邱雅芬指明高桥旨在通过“海洋文学”宣传“海洋学”，背后的殖民扩张心态一目了然。大西仁亦指出高桥将取材于海洋的文学视为日本帝国“海外雄飞”的根基，实为对俄开战的宣传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其塑造的海洋审美符号的具体内涵进行剖析，也并未涉及高桥将海洋审美工具化的实现路径。此外，高桥所塑造的审美符号的历史影响力如何？与当代日本社会产生着互动？是否介入了日本今日所谓“新海洋立国”的语境？这些在先行研究中未受到关注的问题，恰恰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海洋审美论》出版于日英同盟（1902）初缔与日俄战争（1904）的间隙，可谓日本海洋国家意识初步确立并试图进一步谋求亚洲海域霸权的关键历史节点。回溯日本近代海洋发展历程可知，“黑船来袭”迫使日本打破“闭关锁国”的“岛国根性”，明治维新将海洋发展作为“富国强兵”的核心目标。明治政府成立伊始，明治天皇即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年 10 月又发布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吉野作造 33–34），由此拉开了日本海权建设迅猛发展的大幕，在学习西方海洋思想与发展经验的过程中，将海洋关联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尤其在海军建设上可谓举全国之力，通过向英国订购主舰、引进技术自造军舰、兴办海军学校、派遣海军留学生赴英美学习等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海军建设。至甲午战争（1894–1895），日本联合舰队于黄海海战重创北洋舰队，翌年二月迫使困守威海卫的北洋水师覆没，日本由此取代清朝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并以清政府的战争赔款进一步加速扩张，强化其对亚洲海域的控制力。

然而，海军力量的跃升并不意味着海洋文化的同步形成。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期间，日本并未自发地产生外向型、开拓性的海洋精神，而是将海洋视为“恐惧的、迷信的”（幸田露伴 362）存在。明治以降，由国家主导的海权建设对海洋思想带来一些新的影响，但同样未能孕育出海洋审美文化。这些影响主要有：一是幕末海防论的复兴与发展。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人加强海防、海上扩张的思想在明治社会被重新接受，诸多海洋新著集中出现，大石正巳的《富强策》（1892）倡导海军扩张与海洋进军，福本誠日南的《海国政談》（1892）主张海洋拓展与海运振兴，稲垣的《南洋长征谈》（1892）在“南进论”浪潮中最早倡导“海洋”思想。二是海权理论的引入。马汉的《海权论》问世后不久即经金子坚太郎推介传入日本，明治天皇亲自研读将其奉为圭臬，不仅将其列为海军陆军学校的教材，还将该书“分发给日本全国的中学、高中以及师范学校”（张赫名 106），海权扩张思想得以在日本进一步传播。三是出现传播海洋思想的杂志或专栏。如三宅雪岭在杂志《日本人》发表《岛国根性与海事思想》，而《海》《海事杂报》等海洋专刊的设立，则意味着海洋议题开始进入大众文化层面。要而言之，明治时期的海洋思想较之于江户时代的“恐惧”“迷信”，开始与“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显而易见的是，与日本海军建设的巨大飞跃相比，明治时

期基于实用主义发展而来的海洋认知不过是军事力量的衍生物，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家意志层面，对日本社会及普通民众而言，海洋思想的启蒙尚处于起步阶段。

这种根植于双重历史困境的文化断裂在文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日本近代文豪幸田露伴率先指出，日本文学中涉及海洋的作品极为匮乏，亦未有足以彪炳文学史的海洋题材作品，但这种不足不应苛责日本国民，乃是由于古代政治中心远离海洋、幕府时期闭关锁国所致。他乐观预见，伴随日本海洋思想的觉醒，古代日本的“海国之民的愉悦”将重获新生，“与海洋国家相称的文学”必将诞生（360–365）。可以说，幸田关切的乃是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自然地参与历史进程的问题。

相较之下，高桥对海洋文学的缺位可谓痛心疾首，他以一种近乎全面否定的态度批判明治文坛，认为其中充斥着“偏狭放荡的恋爱文学”，直言：“明治所谓文坛，除歌咏星月之新体诗与描写娼妓帮闲之外，别无所长，诚然如此柔弱偏狭！呜呼！三千年间，于东海之滨凛然卓立、傲视一方之我日本民族子孙，若竟以此般柔弱偏狭淫奔之文学为代表，实乃可慨之极矣！”（165–166）

他疾呼“扩海权之要，首在养国民海事思想。欲养此思想，需研海洋学，亦需诱国民向海之趣。”（6）审美表述的滞后显然难以承载日本当时对海权扩张的强烈文化诉求，更不足以支撑日本谋求海洋竞争优势的政治诉求。为弥合这一裂痕，他并不像幸田露伴那样期待海洋审美的自然天成，而是急迫地去构建一种特定审美装置，利用一切与海洋相关的符号去介入、制造与改写“海国记忆”，以推动日本成为“善用海之国”（1）。于是，在“海上雄飞”的假想与冲动下，他的海洋审美体系徐徐展开，其内容涉猎之广，已远超审美范畴。其中“有经世论、外交论、政治论，军事论，殖民论，经济论，财政论、交通论、化学论、教育论等”（6），力求将社会各阶层读者一网打尽，通通纳入以“海洋扩张”为核心的海洋叙事体系。

高桥与幸田露伴之所以出现如此截然相反的态度，原因就在于二者的海洋审美指向完全不同。幸田就文学论文学，其态度相对客观、乐观且从容。而文学并非高桥对海洋认识的起点亦非其终点，他自言“多年志于地理之学，尤于太平洋问题之研究苦心矣”（序言），在日英同盟的刺激下进一步面向海洋，甚至再往前追溯，他是从一位海滨少年在“郁郁不得志”的蹉跎岁月中最终走向了海洋。

高桥铁太郎自诉生长于南海伊豫，号“铁骨居士”，通过其诗集《壮士吟》（1900）可知，他曾在中国浪迹多年，汉学修养颇深，且与康有仪（康有为从兄）等有诗酬唱和之往来。他热切地关注国际时局，居住的铁骨庵中“揭以松阴先生狱中读书之画像及万国地图”（63），亦对主张对外强硬的右翼团体——国民同盟会的政治活动充满共鸣：“于京都东山草庵发无限之感慨”（59–60），常有“报国非无志，却为愤世人”（41）、“空怀王佐才”（42）、“救世志未通”（50）等愤懑之句。尤其面对中国山河破裂的局面，高桥深以为戒，《壮士吟》目的即在于“养青年之意气”（57）以推动日本社会的改革与前进，他直言“若青年意气磅礴何事不能成？推动社会之原动力在于青年之意气。一国之革命在于青年之意气”（59）。

高桥这一思想不仅在此后的《太平洋论》（1902）中延续，更将太平洋研究拓展为承载其无法抑制的民族情绪的绝佳容器，将太平洋作为“青年意气”的实现空间。首先，他认为太平洋是日本的“富国之计”，指出促成日英同盟缔结的原因在于“病态的、不健全至极的所谓日本的膨胀”（6），“今日日本之大问题唯有财富之问题。此财富之增进，日本必须利用太平洋而为之也。”（8）其次，

他认为太平洋关乎日本存亡，是解决日本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不知太平洋而论清国问题，论殖民问题，论贸易问题，论经济问题，论西伯利亚问题，论大洋洲问题，论朝鲜问题，难于向安南王说冰山，向北极人说热带气候。想来日本一切政治问题，应待太平洋问题解决而后始可行之。”（5）而解决太平洋问题的重中之重，高桥认为在于有志之青年，而非“怠惰懒散”之众议院。他呼吁日本青年当以远征太平洋为天职：“我大日本帝国之命运，悬于卿等双肩之上。今若彼等不慨然立起，为我大日本帝国勇往猛进，洒满腔之热血与精力而奋斗，则国家终将不免灭亡。”（16）

由此可见，高桥将太平洋研究视为“爱国之器”、“富国之计”，力倡“利用日英同盟之势，使日本在太平洋上建根据地，以实现在广阔太平洋地域之雄飞”（109）。然而，海洋学实用主义的单一维度已不能完全满足高桥太平洋权力图景之构想，“诱国民向海之趣”意味着要获取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于是，《海洋审美论》作为《太平洋论》的续章，被高桥赋予了海洋地理学的未竟使命，旨在为日本的太平洋扩张乃至海洋霸权的争夺，塑造具有文化空间权威性的解释体系。在高度组织化的审美体系塑造过程中，海洋的意象与精神被刻意拆解、重组，海洋的认知装置在颠倒中面目全非，最终凝结为一系列带有深刻偏执印记的海洋审美符号。

二、被重塑的海洋审美符号：《海洋审美论》的“畸变”

高桥扬言《海洋审美论》旨在囊括海洋所有领域，从“作为海国的日本”、“国民的海事思想”等“海国”民族认同的强塑，到“海与文明”、“海之研究”等海洋地理常识的堆砌，再到“海与文学”、“当振作海洋文学”、“英国与海洋文学”等美学工具化描述，最终落脚于“当培养海洋远征之志”的殖民动员，同时辅以“我祖先海上之勋业”等所谓历史英雄人物的“包装”，内容之繁杂、重复、跳跃，如同无序的迷宫，那些被刻意筛选、强行塑造乃至扭曲的审美符号相互勾连、隐匿其中。毋庸置疑，强烈的“扩张”冲动是高桥所谓海洋审美想象图景的本质。然而，若就此将其简单视为日本海权扩张的宏大叙事的注脚，则极易消融其具体特征，陷入认识的虚无与空洞。只有剥离出文本中那些被重塑的、带有鲜明特征的海洋审美符号，才能进一步明晰日本海权扩张滋生出的复杂触角，揭示其背后真实的畸变逻辑。

“诗化的海洋之美”是高桥塑造海洋美学的口号之一，然其具体论述不过是基于自身知识储备的单薄列举。他宣称“海洋乃诗人之佳题”（73），详尽列举土井晚翠、岛崎藤村、野田别楼等新体诗，浦岛歌、短歌、山上忆良等古典诗作，乃至张若虚、张谓之、赖山阳、成岛柳北等涉及海洋之汉诗。对于海洋文学的历史脉络，高桥几乎全盘抄录幸田露伴所言，不仅未有任何高明之处，甚至粗暴地曲解了幸田的核心结论。幸田将海洋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主要归于古代都城远离海洋、幕府闭关锁国等历史因素，而高桥却进一步将近代海洋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于明治文坛的靡靡之音，认为与“当政者”无关，甚至宣称“文学亡国论之兴起基于此”（180），以“天职”之名义裹挟文坛向海洋转向，逐渐偏离理性轨迹。他将政治责任转嫁于文坛，要求“文学兴国”，其逻辑理路为，通过振兴海洋文学驱使国民领略海洋之美、海洋之利，消除对海洋的恐惧，潜移默化中培养国民的海洋思想，并表示如此一来，“国民岂能不变得有为活泼？国家岂能不走向繁荣昌盛？国民岂能柔弱偏狭？国家岂能衰亡？”（166）然而，高桥试图建立的海洋美学谱系恰恰暴露出其美学视野之贫瘠、目的

之功利，他以“天职”、“海洋兴国”为名对“诗化美学”进行置换，将文学视为“扩张”思想的谷料，简化了文学难题，导致了海洋美学逻辑的异化。

“海洋学”是高桥高举的科学旗帜，但其所谓“海洋研究”同样是基于个人视野的常识堆砌。从世界各大洋的划分、面积、名称起源等，到洋流原理、航海技术等海洋地理知识，高桥试图以科普之名将“海洋”的地理概念注入国民头脑之中。而此地理概念的植入是为了凸显日本于太平洋、海洋之中的地理优势，他宣称日本处于中美海上贸易交易的必经之处，“拥有如此优越地位与良机，若仍无所事事，将来更待何时？”最终目的在于“乘此地利，收太平洋之富，使日英攻守同盟之利永存，以张国威国权”（72）。因此，当他在文中反复强调“海洋是巨大的宝藏”、“利用海洋获取财富”时，原本客观的科学话语逐渐异化为资源掠夺之指南。高桥曾在《太平洋论》中详述太平洋各类重要产物及财富，将田中鹤吉氏“金钱寄存于世间，若欲取之，当勤勉自取”（53）之所谓“金玉良言”引入行文之中，以自由、勤勉之名屏蔽掠夺之实，呼吁日本夺取太平洋之富，以此实现国家富足，解今日财政之困。同时，他还细数英美等国对海洋自然原理的运用优势，并断言欧美诸国国势之所以如此强盛，皆因其重视海洋学研究之故。更将日本与欧美之优势进行对比，声称“于海洋学之智识，日本尚处最幼稚之阶段”（37）。借巨大的技术差距渲染“失海即亡国”的恐慌，将其嫁接为民粹动员的工具。可以说，高桥将发展“海洋学”的学术呼吁异化为“亡国”危机叙事，将“海洋学”发达简单等同于“国势强盛”，将财富掠夺正当化为“海洋之利”的民粹话术，使得科学话语逐渐失去客观立场。

“东洋之英国——日本”是高桥反复塑造的镜像想象。这一“拿来主义”背后承载着其深层的欲望与执念，即通过参照英国的经验，使日本也能迅速崛起为拥有广阔殖民地与强大国力的“海国”。他将英国视为理想范本，宣扬英国作为海国已“进入全盛之境”，而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作为海国“却尚未成功”（33）。在论述英国强盛的原因时，高桥有意屏蔽了帝国主义扩张背后的复杂性与血腥，简单归因于英国海洋学之兴盛、海洋文学之发达，而他力倡的“海洋学”、“海洋文学”正是对这一路径的完美复制与再现。他宣称英国国势隆盛“非海洋文学之功不可”，更进一步对“日本之库克、卡伯特”的渴望（185）。借助对英国这一“他者”的凝视，高桥完成了又一次的符号化过程。他将海洋学、海洋文学夸大为帝国扩张的决定性力量，进而推断日本只需模仿此路径就能重演乃至超越英国的殖民辉煌。此亦即镜像想象的危险所在，它不是对他者的简单模仿，而是有意为日本的殖民扩张寻找合理性参照系，通过单一归因以异化的海洋审美体系代替英国在长期积累与冲突中生成的海洋文化，将复杂的历史进程阉割为容易复制的、机械的线性路径。作为“东洋之英国”的日本，也由此成为畸形的海洋审美符号之一。

“海国日本”是高桥绘制的海洋美学的终极图景，也是最具煽动力、最具破坏性的审美畸变。他通过对历史的肆意剪裁，拼接出一副拥有“辉煌”扩张传统的“海国日本”的记忆图景。从素戋鸣尊“踏波征服朝鲜”、神功皇后征讨三韩，到丰臣秀吉远征朝鲜、伊达政宗派遣使节赴欧，无不被其赋予“进取”“雄飞”之志，成为“我日本国民祖先最富海洋精神”（39）之佐证。在他笔下，日本历史上“冒险的海上远征家”们被重新符号化，原田七太郎虽未实现侵略吕宋的野心，但被高桥视为“日本人以凛烈之意气侵略海外的”（211）豪杰体现，山田长政更是被其视为日本扬威异域的

典范，乃“日本刀锋芒之展示者”（215）。即便是以劫掠吕宋发家的助左卫门，亦被高桥诡辩为“素行虽有可非议之处，然其为时势所造之奇男子，实乃国家精华，此言绝非过誉”（226）。更甚者，高桥借助明清文人王乙曾《乱渐东诗》、戴东原《边警》、都应芳《初闻倭警有感》、王间《彼倭行》、愿应祥《海寇》、皇甫防《海波行》等“抗倭”诗文，以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反衬倭寇的“威猛之势”，歌颂“在东方横行无忌的正是我辈之祖先”，发出“何等豪迈”“何其快哉”之感慨。并号召日本人重振倭寇的“辉煌伟业”，“我国祖先以如此气势横行世界，现代我国民岂能不奋起？”（223）由此，高桥将无耻的劫掠者、倭寇美化为“历史英雄”、“国家精华”之象征，将其暴行与西方殖民并置，以此证明日本拥有对外侵略的“历史正统”，煽动日本社会“应当继承祖先遗志，在海上大展雄图”（238）。

在塑造“海国日本”的过程中，高桥不仅对历史进行了篡改，更有意在现实层面与大陆文明进行切割。他宣称“大陆型国家未来将走向衰亡，大洋型国家则必将日益发达隆盛”（1–2）。因此，他不断强调日本乃海国，“我日本人竟忘日本乃海国，不以岛国为耻，反强求大陆之气度与抱负，何等陋见也”（33）。他将德川幕府时期的锁国政策视为民族精神的堕落，将日本曾经对大陆文化的崇拜批判为“忘却祖先伟业”的错误。通过与“大陆文明”的决裂，他意图将日本从东亚大陆文化圈中抽离出来，强化与英国等“海国”的联系，借此呼吁日本重新回到“海国”之路。同时，他还将俄国视为与“海国日本”相对立的大陆国家，直言“大陆的俄罗斯如此热心大胆地继承彼得大帝的遗志，积极实施海上雄飞的策略”（41），而日本“若仍为区区中华四百州所眩惑，则断不可称为大洋大国之襟度”（31），以此激发所谓“海国男儿的本色”，鼓动“雄飞之志”、“进取之气”。换言之，高桥通过与大陆文明的切割、煽动日俄危机氛围，塑造一幅“海国日本”的现实危机图景，进一步为加速殖民扩张寻找合理化借口。由此，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阐释下，“海国日本”被异化成带有必然的海外扩张使命的典型符号。

通过以上对海洋审美符号的解构与剖析，我们可以看到，高桥所谓审海洋之美、述海洋之利、绘海洋之景的幻象一触即破。其所谓“美”，并非口号所言享受“海洋诗性美学”，而是以“日本男儿本色”、“天职”、“文学兴国”进行置换，打造政治驯化工具；其所谓“利”，虽悬挂着“海洋学”的科学旗帜，实为掠夺“海洋宝藏”“失海即亡国”的殖民利益辩护；其所谓“景”，无论是“东洋之英国”还是“海国日本”的想象，皆为篡改历史、美化掠夺行径的“帝国之景”，是与大陆文明决裂的具有扩张野心的“殖民之景”。高桥宣称“《海洋审美论》实为国家大计而作”（259），就意味着美学的自主性在撰文之初就已被剿灭，其最终塑造的只是那些被阉割、被扭曲、被异化并最终服务于殖民扩张的符号而已。

三、操纵海洋审美重塑的内在机理：狂热民粹分子的权力诉求

《海洋审美论》已成为研究日本海洋文学与海洋想象的重要文本，与其影响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者高桥铁太郎却在历史中湮没无闻。除散见于各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其生平经历已几不可考。然而，其著作却得到德富苏峰、福本日南、菱花山人、桂湖村、赤沢雄山等诸多文士推荐，亦在当时引发广泛共鸣。究其根本，皆因他所代表的，是在明治时代社会结构激变中浮现出的一个新兴群

体——非传统知识精英。这一群体大多出身平民，兼具传统汉学与新式教育的学习背景，却因门第、仕途等限制难以融入由华族与官僚主导的传统精英体系，亦未能跻身政坛掌握政治权力。但是，他们能够利用报刊、出版等舆论环境的变化获得影响社会的能力，进而成为文化的塑造者与国家想象的参与者。不过，其政治边缘处境导致“难以抑制的忧国之情”（110）往往转化为“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日本当局“强兵而未富国”，指责日本扩张步伐迟缓；另一方面又渴望通过文化路径介入国家未来走向的话语主导权，为日本帝国主义加速扩张辩护。

高桥狂热的海洋论述正是这一诉求的具体呈现，并展现出极为清晰的实践路径。其一，占领太平洋“根据地”——友谊群岛。高桥认为日本夺取太平洋霸权必须借日英同盟之势建根据地，并具体指向澳洲及周边岛屿，尤其是“今仍独立、尚未被欧美染指的唯友谊群岛（汤加）”（67）。他直言：“若得此岛，足可维持太平洋势力。故日本应力图在此扶植势力，或租借为煤炭储地、海军根据地，或占领为殖民地、移民地”（68）。高桥疯狂地煽动日本加速扩张的野心，赤裸裸地为非义之争辩护：“国际关系虽须顾及，然决不足忧。既已实行占领，则为我物，复何难哉！”（68）在高桥看来，不择手段地抢掠海上据点是日本帝国的必经之路。

其二，操纵公共舆论，促成帝国主义的“正义”转化。与地缘战略配套的是高桥对于“帝国主义”的审美化与合理化。他不断强调日本“海国”身份的特殊性，反复渲染“失海即亡国”的危机叙事，以“被逼无奈”的受害者身份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之路正名：“故吾辈为国土与同胞含泪执帝国主义，不得不实行之。帝国主义意味着大帝国建设，换言之即侵略主义、掠夺主义，诚野蛮之主义。然吾人岂忍坐视国土与同胞灭亡？”（70）。在《海洋审美论》中，他更是通过异化海洋审美符号进一步赋予“帝国主义”历史必然性，认为尽管“帝国主义是 20 世纪的头号恶魔”，但“只要国家渴望独立生存，就必须尊奉这一主义”。他以“尊奉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胜利者”为由，宣称日本的祖先“正是帝国主义的信徒，从平民起家，在海外立下功勋的，难道不都是帝国主义的信徒吗？”（235）可见，高桥屡屡借助扭曲的海洋审美话语，将帝国主义狡猾地转化为日本“民族生存的必要手段”，以“宿命”与“正义”的面具掩盖其暴力本质，使之在日本社会中获得更广泛的接受。

其三，推进南洋贸易，高度契合“南进”思想与政策。在现实利益诉求方面，高桥直言南洋诸岛是“日本理想的贸易伙伴”（6），而日本邮船会社已开通“木曜岛—汤斯维尔—麦凯—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等南洋航线，极力主张日本国民与政府应充分利用“新领土台湾”之优势，“经营南洋贸易”（80）。与此同时，他还援引原田孙七郎、山田长政、滨田弥兵卫等经历，强调历史上“印度南洋一带，我邦人武勇之名远播”，暹罗等国专辟城下一隅为居留地，“称之为‘日本町’”（213），籍此营造出一种“南洋”自古就在日本影响力之内的幻象。由此，高桥的海洋论述经由“太平洋-海洋-南洋”的地域转变，与明治时期开始酝酿的“南进”政策实现合流。“南洋”被其包装为日本扩张的“天然领地”，其所谓太平洋扩张版图也随之不断扩大。

其四，将“海洋扩张”思想渗透到教育体系。高桥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舆论造势，而是试图通过教育手段植入其海洋主张。他提出，应在中等学校将海洋学设为必修科目，理科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理科专业应集中精力研究海洋学，还应派遣专门研究海洋学的学者前往英国、德国、美国等海洋学最为发达的国家留学，深入研究最新的学理，并鼓励各种海洋学探险和远征进行调查。对于文

部省设水产学校、造“快鹰九号舰”培育远洋渔业人才、派遣外国贸易练习生等政策，他虽赞成然仍觉不足，敦促民间志士与政府携手推动事业扩张：“虽稍合吾辈之意，然政府官吏与民间志士仍不可满足，亟须进一步奖励扩张此等事业，以收利益，此诚急务中之急务。”（59）这一主张不仅是对海洋学知识体系的重构，更是借助教育结构实现海洋扩张思想的全方位渗透。

其五，明确提出以青年为核心的社会动员机制。高桥将青年作为海洋扩张思想的首要受众，将海上扩张绑定为国家与青年的“共同事业”，号召青年“远征”：“海洋远征！海洋远征！必须奋起培养海洋远征的壮志雄心！”（200）他将倒逼政府转向更为激进的扩张政策转嫁为青年责任：“必须由真正经世济国之士去督促激励这些不负责任、怠惰的政治家，大力推进作为国家富强之策的太平洋策略的实施”（111），“必须以年轻气盛、富有进取精神、兼具知识与勇气之青年志士为核心，勇往直前、努力奋斗！”他将太平洋包装成作为“大丈夫”、“海国男儿”“一试雄图的绝佳战场”，煽动青年“同仇敌忾”，以此动员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有学问、有智识、有勇气、有胆力之有为青年，当慨然向太平洋”，“得意之士、失意之士，俱进至太平洋，以张帝国之势”。他疾呼：“来！来！到太平洋去，任尔挥洒旷世宏图、满腔磊落！凡胸有肮脏郁结、慷慨悲愤难泄之士，请至太平洋上策一大图，此乃国家与诸君共贺之伟业”（75）。高桥巧妙地将社会积累的不满引导至对外扩张的路径上，形成一种由下而上的民粹式动员策略。

“尽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会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被发挥到了极致。”（John W. Dower 10）高桥作为日本非传统知识精英中狂热的民族主义代表，对海洋审美的操纵映射出这一新兴群体利用文化路径介入国家话语的实践倾向。他们通过公共舆论、教育体系操纵“海国日本”的民族想象，并与具体的战略谋划相结合，将日本各阶层社会的不满引向海洋空间，尤以动员青年群体为核心，自下而上倒逼政府加速扩张步伐，以满足于版图扩张的欲望与野心。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叙事手法，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化动员式帝国主义话语范式，也是一条值得高度关注的连接过去与当下、文化与政治的隐秘通道。

四、反复被激活的“畸变符号”：海洋叙事下的暗涌长流

无论是高桥铁太郎所异化的海洋审美符号，还是其构建的畸变叙事模式，其无形的影响实则更为深远。它们在日本不断深化的扩张史中反复出现，且未随战争的终结而消亡，反而在战后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存在于审美批评、文学创作、社会舆论乃至国家政策之中，呈现出顽固性、周期性、连续性的特点。尤为值得警惕的，这一暗流在当今日本所谓“新海洋国家”的框架下存在再次被激活的隐患。

在海洋审美批评方面，柳田泉于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日本海洋文学研究，与高桥如出一辙。高桥以“天职”裹挟“海洋文学”为日本扩张服务，柳田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海洋文学”范畴收缩为“南进文学”，以审美批评之名为“南进”的扩张进行合理化包装。柳田几乎完全复制了高桥惯用的受害者叙事逻辑，利用日本与中国、欧美等国发生的冲突，渲染日本在国际社会备受欺压、无力反抗的“弱国形象”，煽动日本社会的民族情绪，掩盖日本海外扩张的野心。与此同时，柳田承袭高桥将文学政治化、工具化的做法，认为“南进文学”有着毫不逊色自然主义文学、浪漫主

义文学的文学价值，“具有宏大的国民理想、国民感情”，以此取代文学自主性，巧妙地为日本海洋文学中歪曲历史事实、煽动海外扩张的作品裹上“爱国”、“理想”的外衣，迷惑日本国民的历史认知与现实判断（113）。由此可见，高桥所塑造的畸变的海洋叙事，在柳田手中变本加厉为“南进”政策服务的、赤裸裸的文化操控手段。日本扩张过程中对“海洋文学”持续而深入的政治化重塑，由此可见一斑。

被高桥赋予正当性与英雄色彩的畸形“倭寇”叙事，早在明治时期便频繁出现，战后依然“热度不减”。自矢野龙溪的《浮城物语》（1890）开始，倭寇的暴虐性即被文学的浪漫书写所淡化，随后福地樱痴的《镇西对外谈》（1904）、《元寇物语》（1904）更直接将“倭寇”塑造为“站在日本国防第一线上的勇士”（柳田泉，69）。与此同时，对倭寇行为的美化还外溢到非虚幻叙事领域，石井研堂的《海国伟人传》（1896）、伊藤银月的《日本海盗史》（1904）皆以史料梳理的手法为倭寇行为披上民族英雄的外衣，木村鹰太郎通过翻译拜伦诗作《海盗》（1906）将西洋“浪漫主义”海盗形象移植至日本语境。进入昭和时期，通过美化倭寇为“海国日本”推波助澜更是成为常态，“东洋史学”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在《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1942）中企图从根本上为“倭寇”张目和“正名”，以“和平贸易”来定义倭寇的武装走私甚至劫掠行为，并将倭寇在明朝国土上的杀掠以及与明政府的对抗，说成是为了明朝贸易伙伴的“侠义之举”（郭尔雅 106）。

战后，倭寇题材甚至成为日本海洋叙事的一种传统，以“海洋冒险小说”之名不断渗入大众文化之中。山冈庄八《八幡船》（1952）重拾锁国时代日本武士的“海外飞跃梦想”，此后还有村上元三《八幡船》（1958）年、南條範夫《海盗商人》（1958）、早乙女貢《八幡船伝奇》（1978）、白石一郎《海狼传》（1986）、《翱翔之倭寇》（1990）、笹沢佐保《海盗船幽灵丸》（2003）、和田竜《村上海盗之女》(2013)等以倭寇为题材的作品不断涌现。“倭寇”作为“海上英雄”的符号进入持续再生产，使高桥所代表的畸形海洋叙事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成为国家认同、民族想象建构中可随意调用的审美符号。

在此基础上，一批新的“海洋英雄”形象，即“海战英雄”被塑造出来，以海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则成为这种新符号的载体。自大正时期起，集体英雄式的海战叙事已初具雏形。1913 年，阿武天风与押川春浪合著的《战败秘录 俄国舰队全歼行》以日俄战争为背景，将日军“以少胜多”胜利渲染为民族荣耀，呼应“海上雄飞”的幻想。战后，这一叙事逻辑亦未中断，反而借书写“战争受害者的伤痛回忆”制造“民族苦难记忆”，以此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一定程度上遮掩、淡化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如吉田满在《战舰大和之末日》（1952）描述 1945 年日本战舰“大和号”冲向冲绳海域、决一死战的“悲壮”场景，称之为“象征着大日本帝国最后的荣光”。吉田俊雄、半藤一利合著的《全军突击-莱特岛海战》（1970）则描绘日本二战中最后的海战，充满对“终极抵抗”的日本海军的歌颂。与吉田一样具有海军服役背景的作家阿川弘之则通过《山本五十六》（1965）、《米内光政》（1978）与《井上成美》（1986）等海军将领的人物评传，进一步美化并持续塑造新的海洋英雄形象。莫嘉茵等学者曾指，日本屯于“太平洋战争”的当代海战书写，实为一场错位的“海国”记忆，是“是囿于日本内部的、日本人刻意建构的‘受害者记忆’，与亚洲国家人民的情感之间存在巨大的裂隙”（15）。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这种“爱国者”与“受害者”的叙事方式可以追溯

到明治时期以来以高桥为代表的畸形海洋叙事模式，完全可以说，“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海战书写，正是高桥海洋叙事的延续与演化。

需予以高度关注的是，21 世纪以来，日本加速推进“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2007 年通过《海洋基本法》实现“海洋国家”身份的法律化、制度化，2013 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更是首次明确将海洋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对此，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扩张主义、现实主义色彩日趋浓厚”（吕耀东 3），且“不断突破武器装备出口、集体自卫权以及海外派兵的限制，其现行海防体制也逐渐充满扩张性”（况腊生 87）。换言之，日本对海洋身份的重塑不仅承载着政治、经济、安全与外交等多重使命，且深藏扩张逻辑，系统化构建“海国文化记忆”已成为其重要的话语资源与文化支撑。

在日本所谓“新海洋立国”战略的形成过程中，高桥所代表的畸形海洋叙事模式再度沉疴泛起。正如苗吉所言，“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建构的产物”（97），这一进程本质上可视为明治时期非传统精英群体以话语权介入国家战略的历史重演。日本学者川胜平太、白石隆对“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对立设定，其实质并未超出高桥所谓“大陆国家走向落后、海洋国家走向强盛”的叙事框架。同时，“威胁叙事、对抗性话语在当今日本仍喧嚣未散”，其海洋叙事具有“鲜明的中国指向性与中国针对性”（陈刚 68），刻意推进“去中国化”和“脱中国化”以完成所谓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苗吉 95）。换言之，当代日本又一次通过强调自身的“海洋性”来重新洗牌历史谱系。可以说，百余年前高桥所代表的叙事结构与文化幻想，以更为制度化、隐蔽化的方式渗入当代日本海洋战略之中，持续影响着日本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对外认知的投射。

与此相呼应，日本在海洋文学领域也出现了政界、学界与产业界合力推动的态势，自 1997 年至 2006 年连续举行十年的“海洋文学大奖”即为显例。尤其是自 1998 年起，海洋文学大奖增设特别奖，评选标准表面强调“在海洋文学体裁（仅限于小说、纪实文学领域）的著作活动中表现突出、作品优秀的健在作家。”②但从实际授奖情况来看，这一奖项几乎全部颁发给以描写倭寇、海战等题材为主的作家，显示出对特定叙事模式的倾斜与偏好。如 1998 年白石一郎获奖，其获奖理由为“凭借《海狼传》（第 97 届直木奖获奖作品）、《战鬼们的海》（第 5 届柴田炼三郎奖获奖作品）、《风云儿》、《异人馆》等从海洋描绘日本历史与人物群像的作品，成功将读者兴趣充分引向海洋世界，做出卓越贡献。”③1999 年阿川弘之获奖，其理由为：“凭借《春之城》《暗黑波涛》《战舰长门的生涯》《井上成美》《新版山本五十六》等以海洋为舞台描绘战争与人性纠葛的作品，以及《女王陛下的阿房船》和随笔集等，著航海之魅力，将激荡日本之海洋与舰船、和平之海的魅力穿越世代传递给读者，做出重要贡献。”④一定程度上而言，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与海洋扩张被包裹进“历史群像”的概述之中，战争的残酷与不义被消解于“激荡之海”、“和平之海”的阐释之中，在审美与历史之间再次被制造出模糊的记忆界线。

而该奖项的评选标准也并未局限于文学范畴，其授奖对象和理由显露出更深层的政治意图。2002 年，特别奖颁发给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的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理由为：“凭借《不归之海》《关于风的记忆》《我人生中的时光》等基于游艇竞赛与航海体验创作的多部作品，通过著作显著提

升大众对海洋与船舶的关注度，做出重要贡献。”⑤然而众所周知，石原长期以极端右翼立场臭名昭著，其言行充满军国主义色彩，不仅大力鼓吹神化“神风特工队”、否认南京大屠杀并诋毁中国，还资助在钓鱼岛建灯塔，甚至于 2012 年公然制造“购买钓鱼岛”闹剧。而如此之人却曾以海洋文学之名登堂入室，其获奖背后隐含的政治象征意义不容忽视。2004 年，又有画家、海事评论家柳原良平获奖，其获奖理由为：“通过船舶与港口的画作及著作，提升国民对海洋与船舶的广泛关注，做出贡献。”⑥可见，“海洋文学奖”的功能早已超出纯文学审美范畴，成为国家海洋文化塑造工程的一环，旨在为日本的“新海洋国家”构建造势，寻求更广泛国民的文化认同。

事实上，无论是“海洋文学大奖”的设立评选，还是“海之日”这一旨在承载海洋文化记忆的节日设定，皆可视为《海洋基本计划》中“增进国民海洋理解”目标的前奏与铺垫，其实质为日本政府利用更多元的记忆媒介系统性重塑“海国日本”国民认同的策略。这一过程中，日本不断提出更为细化的目标与策略，诸如“怀抱关于海洋的梦想、体会感动、感受海洋魅力”、“表彰在海洋相关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利用优越的海岸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源”，以及推进水下遗迹的保护与综合开发，均被明确纳入国家文化政策体系之中，被赋予“理解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遗产”的意义。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在日本“新海洋立国”战略持续推进中，借助抽象的文化记忆塑造国民对“海国日本”的认同将成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化且日趋细化的文化建设工程。然而，在越来越多元化的传播途径下，高桥时代所代表的畸形海洋叙事模式及异化的海洋审美符号也正被以更隐蔽、更巧妙的方式嵌入新一轮的国家战略话语建构之中。在“和平之海”“海洋环境保护”的表象下仍存在涌动着其扩张意识的暗流，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日本的历史理解与海洋认知。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醒与深刻关注。

结语

高桥铁太郎用尽平生所学、甚至时有捉襟见肘之嫌的海洋叙事，决非理论体系完整、思想深邃的经典之作，但它所释放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尤其当“海国”屡屡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文化牌”之时，正是以高桥为代表的无名之辈们将上层的抽象思考积极转化为具体的符号，那些被篡改的畸形的历史记忆成为煽动民意、遮蔽侵略本质的有效工具。更值得警惕的是，其后继者们几乎无需创新，只需不断重复既有话语并赋予新的政治意象，就能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叙事重新推入公共议论场域，从而了无痕迹地在“海国日本”与“新海洋立国”之间完成暧昧不清的转换。这种未经批判、未加反省的民粹主义叙事体系不仅在战前、战时被不断复制并强化，甚至在战后、乃至今天，仍以更隐蔽、更柔性的方式嵌入所谓“新海洋立国”的政策话语之中，存在着扩张意识重新被激活的隐患。尤其是当前某些过度强调历史中偶然、极少数异质声音的倾向，实则构成对真实历史结构的遮蔽与修饰，不仅可能滋生历史虚无主义，还将与日本民族集体记忆中根深蒂固的战争受害者、牺牲者意识相勾连，进一步消解本就稀薄的对反法西斯胜利与加害责任的集体认知。面对高桥及其同类“名不见经传”却暗潮汹涌的文本，应保持清醒的学术立场与历史批判精神，警惕日本通过历史屏蔽效应、以畸形海洋叙事粉饰侵略史的企图。因此，剥离日本“海洋审美”外壳之下的权力扩张本质，既是对日本海洋文化记忆的真实反映，也是对当前及未来国际海洋话语竞争的必要回应。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知识图谱建构的东亚海域文化研究”（项目编号：ZR2024QF3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Shang Qian [ID] https: //orcid.org/0009-0001-7755-7080

Gong Xueso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6853-5413

注解【Notes】

① 内閣府．海洋基本計画（第 1 期）

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1/plan01.html

② 日本財団図書館（電子図書館）「海洋文学大賞の実施」の報告書

https://nippon.zaidan.info/seikabutsu/1998/01552/mokuji.htm

③ 第 2 回海洋文学大賞作品の決定について（H10.5）

https://www.kaijipr.or.jp/lamer_event/umi_event6-2.html[2026-1-26]

④ 第 3 回海洋文学大賞作品の決定について（H11.5）

https://www.kaijipr.or.jp/lamer_event/umi_event6-3.html

⑤ 日本財団図書館（電子図書館） 第 6 回海洋文学大賞受賞作品集

https://nippon.zaidan.info/seikabutsu/2002/00676/contents/039.htm

⑥ 日本財団図書館（電子図書館） 第 8 回海洋文学大賞受賞作品集

https://nippon.zaidan.info/seikabutsu/2004/00107/contents/0021.htm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陈刚、杨伯江：《战后 80 年日本国家战略流变中的海洋战略》，《东北亚论坛》，第 3 期，2025 年，第 54–72 页。

[Chen,Gang, and Yang,Bojiang. “Japan’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Evolution of Its National Strategy over the 80 Years since World War II.” *Northeast Asia Forum*, no. 3, 2025, pp. 54–72. DOI: https://doi.org/10.13654/j.cnki.naf.2025.03.004]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Dower, John W.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Translated by Hu Bo,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郭尔雅：《宫崎市定“去寇化”倭寇观及其反历史倾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2020 年，第 104–111 页。

[Guo, Er-ya. “Miyazaki Ichisada's ‘De-piratization’ View of the Wokou and Its Anti-Historical Tendency.”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6, 2020, pp. 104–111. DOI: https://doi.org/10.13885/j.issn.1000-2804.2020.06.012]

况腊生：《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日本研究》，第 2 期，2022 年，第 76–88 页。

[Kuang, Lashe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Maritime Strategy and Maritime System.” *Japanese Studies*, no. 2022, pp. 76–88. DOI: https://doi.org/10.16496/j.cnki.rbyj.2022.02.008]

幸田露伴．『露伴全集』第 24 巻．岩波書店，1979 年．

[Kōda Rohan. *Rohan zenshū. Vol. 24,* Iwanami Shoten, 1979.]

吕耀东：《试析日本海洋战略理念及对华政策取向》，《东北亚学刊》，第 2 期，2015 年，第 3–9 页。

[Lü, Yaodong. “An Analysis of Japan's Maritime Strategic Concepts and Its Policy Orientation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 Studies*, no. 2, 2015, pp. 3–9. DOI: https://doi.org/10.19498/j.cnki.dbyxk.2015.02.002]

苗吉：《“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第 3 期，2017 年，第 77−108 页。

[Miao, Ji. “China as the ‘Oth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al Identity.” *Foreign Affairs Review (Journal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no.3, 2017, pp. 77–108. DOI: https://doi.org/10.13569/j.cnki.far.2017.03.077]

莫嘉茵、邱雅芬：《错位的‘海国’记忆：论日本当代海战文学》，《大连大学学报》，第 4 期，2023 年，第 8−14 页。

[Mo, Jiayin, and Qiu,Yafen. “Rewritten Memories of ‘Maritime Country’: A Study on Japan's Naval War Literature.” 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no. 4, 2023, pp. 8–14.]

大西仁：「戦時下の日本における海洋文学の提唱とその経緯」.『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第 10 巻，2020 年，第 57–75 页.

[Ōnishi Jin. “Senjika no Nihon ni okeru kaiyō bungaku no teishō to sono keii” *Border Crossings: The Journal of Japanese-Languag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10, 2020, pp. 57–75.]

邱雅芬：《日本海洋文学研究现状及展望》，《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第 5 期，2018 年，第 78−84 页。

[Qiu, Yafen.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Japanese Maritime Literature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 Dynamics Research*, no. 5, 2018, pp. 78–84.]

高橋鐵太郎：《海洋審美論》。文明堂，1903 年。

[Takahashi Tetsutarō. *A Theory of Maritime Aesthetics. Bunmeidō*, 1903.]

——：《壮士吟》。文明堂，1900 年。

[---. *Songs of Brave Men.* Bunmeidō, 1900.]

——：《太平洋論》。文明堂，1902 年。

[---. *A Theory of the Pacific.* Bunmeidō, 1902.]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千倉書房，2009 年。

[Yano Nobu. *The Genealogy of “Southern Expansion”: Japan’s Historical View of the South Seas*. Chikura Shobō, 2009.]

柳田泉：《海洋文学と南進思想》。ラジオ新書，1942 年。

[Yanagita Izumi.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the Idea of Southern Expansion*. Rajio Shinsho, 1942.]

吉野作造：《明治文化全集》。日本評論社，1928 年。

[Yoshino Sakuzō.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eiji Culture.* Nihon Hyōronsha, 1928.]

张赫名、孙晓光：《近代日本海洋扩张的历史原因分析》，《史学月刊》，第 6 期，2025 年，第 102−111 页。

[Zhang, Heming, and Sun, Xiaoguang.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Japan’s Maritime Expansion in Modern Tim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no. 6, 2025, pp. 102–111.]